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陈学明 吴晓明/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丛书副主编

内格里的 “非物质劳动”理论 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李春建 马丽 /著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Antonio Negri's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r



重庆出版社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陈学明 吴晓明 /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 丛书副主编

内格里的 “非物质劳动”理论 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李春建 马丽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 李春建,
马丽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1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229-11866-2

I. ①内… II. ①李… ②马… III. ①内格里—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研究 IV. ①F0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6131号

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NEIGELI DE “FEI WUZHI LAODONG”LILUN JI QI DANGDAI
YIYI YANJIU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李春建 马 丽 著

陈学明 吴晓明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丛书副主编

责任编辑:别必亮 吴 熊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蒋忠智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天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2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60千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866-2

定价: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序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近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85 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 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年,全国又建立了21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述?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为了把前

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出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续总序

这套题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丛书，早在 10 年前就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前后共出版了近 20 部书，由俞吾金教授任主编，陈学明、吴晓明任副主编。当今天再次筹划继续出版这套丛书时，俞吾金教授已谢世一年多，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俞吾金教授在“总序”中已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特点，以及对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都已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这里，我们仅做若干补充。

与 10 年前相比，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刻认识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明确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二级学科。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二级学科，而主要是通过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体现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流传进我们中国的。中国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长达 30 多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整个译介和研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从 21 世纪初至现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实践中，先前的思想障碍逐渐被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要求出现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意义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助成并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20世纪末到现在，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某种对照性的理论资源，既为论证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理论说明，也为破解中国道路面临的难题提供借鉴性的理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因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显学。我们这套丛书的价值与意义是同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清醒地知道，一套丛书的命运固然主要是取决于社会对其需求的程度，但同时也离不开这套丛书自身的品质。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使这套丛书的品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我们打算做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进：

其一，原先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主要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或者某种思潮、某种流派，现在我们力图强化“问题意识”，在继续推出研究人物、思潮、流派的著作的同时，着重出版以问题为导向的著作。

其二，原先我们的视野主要局限于西方的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现在我们试图进一步扩展视野，把更多的思想家包含进来。具体地说，本丛书所涉及的国外思想家将包括“三个圆圈”：“核心的圆圈”还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再扩展到那些并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国外左翼学者；最后再往外扩展到那些“左翼”以外的学者，只要他的研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就将成为我们

的研究对象。

其三,原先本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我们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师以及在这里就读的博士生,现在我们将本丛书扩展成整个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丛书,热忱地欢迎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相关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列入本丛书出版。

其四,原先本丛书的著作基本上是以“述介”为主,即主要是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把其讲清楚。现在我们提倡在走进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从研究对象中走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做出深刻的研究,本丛书还会继续出版“述介”型的著作,但将更加重视“研究”型的著作。

最后,我们在此对重庆出版集团致以谢意。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指出,重庆出版集团是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早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他们就支持徐崇温教授推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该丛书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当时作为青年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该丛书的写作和出版。我们所编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名著提要》(三卷本),作为该丛书的一个部分,在上海推出时,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亲自参加出版座谈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重庆出版集团所做的工作。近30年时间过去了,重庆出版集团不改初衷,继续竭尽全力支持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在与我们商谈出版这套丛书时,根本不与我们涉及当前出版图书通常所见的那种所谓“出版贴补”之类,这着实使我们感动。这使我们在重新策划这套丛书时,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希望以交出更多的优秀著作来回报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陈学明 吴晓明

序

读完李春建、马丽的新著《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慨，几年前李春建复旦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二者相比，无论广度、深度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可以说这是我看到的关于非物质劳动的最好著作，反映了年青学子广博的学术修养和分析世界重大事件的能力。

2000 年《帝国》的发表，才使内格里进入华人的世界，哈特、内格里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提出了与帝国主义理论不同的帝国理论，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资本主义最初只在国内发展，因而生产过剩，危机不断。19 世纪下半叶，资本在国家的帮助下开始向外拓展，由此爆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大战，即帝国主义时期。二战以后，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帝国时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推动资本的增长，相反使世界资本总量比战前减少一半，而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是扩大了世界市场，而是缩小了世界市场，战争的教训使发达国家由竞争走向垄断，走向针对落后国家的世界联合，各国放弃了殖民地战略，开始了美国以门户开放为主导策略的世界市场重建，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代表，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以确保资本在任何国家的随意进出。这一战略不仅使资本恢复了元气，而且使国际资本总量很快超过了战前，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统一市场的真正形成，资本似乎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如何分析和解释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争论，世界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消亡论、后现代论、知识经济论，纷纷登台，哈特、内格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帝国理论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何把握时代的变化和本质,是哲学思考的首要使命。哈特、内格里认为当今的世界不是听命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听命于一种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这种“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①。“与帝国主义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帝国并不建立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疆界或壁垒。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去地域化的统治工具。”^②“过去曾经是数个帝国主义强权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在重要方面,已经被单一权力的观念所取代;这个单一的权力具有限制所有强权国家的优势,并以一元的方式组织它们,而且是在绝对后殖民与后帝国主义的共同权利观念下对待它们”,因此,“在帝国的平坦空间中,权力的场所是不存在的——权力无所不在,亦无处存在”。虽然在形式上帝国不表现为国家,但是在本质上帝国依然是资本的代表,“帝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代表的是“集体资本的秩序”。正是这种秩序确保了战后资本的迅速发展和人的全面异化。哈特、内格里赞成福柯、法兰克福、科学技术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但又认为他们的分析过于片面,而结论又过于悲观而令人窒息。哈特、内格里认为分析现代社会不能离开现代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但是这里的劳动不是一般的物质劳动,而是以非物质劳动为主的劳动,因此反抗资本的主体不是一般的物质劳动者,而是以非物质劳动者为主体的大众,非物质劳动者的重要性要高于物质劳动者。

物质劳动、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资料、物质生产条件是马克思分析历史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但是在“左”的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物质劳动往往被归结为工厂劳动,物质劳动者往往被归结为工人阶级,而其他的劳动者往往被看作是半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力量,这种理论的实质是看不到现代社会人民大众的普遍异化,因而形不成反抗资本主义的大众力量。在美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且财富的绝大部分不再是产业工人创造,而是由

^①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i.

^②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ii.

非产业部门创造,例如金融、科技、服务、管理,因而要完整地把握当今时代,必须把视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于金融、科技、服务、管理领域的劳动者也是雇佣劳动者,因此在内格里看来,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①。因而当今的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传统的物质劳动者,也包括一切非物质劳动者,即大众,“大众就是其在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阶段的替代自主的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②。这个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不谋而合,“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劳动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他们就是大众,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雇佣劳动者遍布全球,资本正是对全球的剥削,才达到今天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帝国。因此李春建对内格里非物质劳动定位基本准确:“非物质劳动不仅是帝国得以构建的社会本体论,是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基础工具,而且也同样是大众这一全球无产阶级得以形成的基础。”“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并没有突破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与剩余价值学说,相反倒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活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当代价值。”

不仅如此,李春建还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帝国理论的核心概念。帝国的统治必须依赖于两种劳动,一种是物质劳动,生产供人们吃、穿、住、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另一种就是非物质劳动,“即创造非物

^①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p. 52—53.

^② 刘怀玉、陈培永:《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区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主体的建构》,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9年第2期,第73—82页。

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甚或情感反应的劳动”^①。其目的有三:一是通过科学、技术、信息、交往、金融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二是通过知识、传媒、政治上层建筑维护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即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三是通过服务、交往、情感交流推进人的自身再生产。内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体现出一种取代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劳动’”^②。因此不了解非物质劳动,我们就不能理解今天的物质生产,今天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和人的自身再生产。虽然“非物质性劳动在全球劳动中只占少数,而且,它只是集中在全球某些主导性地区”。但是“我们在说非物质性劳动占据霸权地位的时候,指的毋宁是非物质性劳动在质量上占据了霸权地位,并给其他劳动形式以及社会本身施加了一种倾向性影响。换句话说,非物质性劳动在今天所处的地位正如 150 年前工业劳动所处的地位一样,那时,工业劳动只占了全球生产的一小部分,并且集中于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但却对其他的生产方式构成了霸权。正如在那时候所有劳动方式及社会本身都被推向了工业化一样,今天,劳动和整个社会都得进行信息化,要变得更智能化,更可交流化,更情感化”^③。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非物质劳动的提出,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理论,即除了物质生产,其他的人在干什么?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除了进行物质生产,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精神生产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生产,社会的生命就会中断,社会的真正生命在于五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内格里用非物质劳动模糊地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更高领域,这是值得庆贺的,但是他盲目地批判物质生产,批判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却是偏颇的,既显得浮浅,也显得偏激。

为了超越唯经济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内格里提出了生命政治理

^①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8.

^②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8.

^③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9.

论，即从人的生命权力的角度提出对帝国的评判。在内格里看来，人的生命权力是人的最高权力，它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人的生命权受到极大的摧残，因此，内格里特别强调“我们的分析必须聚集在生命权力的生产维度上”^①。“要把所有这些讨论引到生命的生产性维度这一问题上。……要确定这一概念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超越任何纯自然主义的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②也就是说，要从生命的历史生成角度研究人的生命权力，不能把人仅仅看成经济动物，从这个角度讲，人在帝国的统治下受到全面的异化，大众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受奴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③。“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帝国是一只死劳动积累的吸血蝙蝠，它只有靠吸食活人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④与福柯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内格里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未来主导世界的大众正是在反抗帝国的过程中成长。“与其说是在压制，不如说是在生产主体。”^⑤主体正是在反抗压制的过程中生成的。他认为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的概念，但福柯的结论却是悲观的，“福柯的身体令人感到绝望，它永远是静默而被动的，它处在各种权力的摆布和操作下而听天由命，它被塑造，被生产，被改造，被操纵”^⑥。内格里认为在资本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大众才是未来社会的真正主体，“大众才是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生产力量，而远离大众的活力，帝国仅只是一件用来俘获的工具”^⑦。因此，“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去生产客体，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这是

①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

②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21.

③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④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2.

⑤ [美]哈特、[意]内格里著，王行坤译：《大同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⑥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⑦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2.

我们的伦理和政治筹划的出发点”^①。也就是说,内格里通过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分析,发现了取代帝国的主体力量——大众。而这一结论是通过高扬人的生命权力达到的。“工人阶级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衍生物,而是一种真正对立的主体,它能够通过自己的斗争打破资本的逻辑和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社会。”^②因而理论的“第一位和最基本的任务是去确认、肯定和促进现存社会力量中的积极因素,它们指向一种新的替代型的社会,一个即将来临的社会。潜在的革命总是内在于当代社会领域”^③。并且是内在于劳动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讲,超越理性经济人的狭隘眼界,从完整的人的全面生产角度,才能真正发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主体力量,内格里虽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但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正因此,内格里非常重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哲学地位,认为“《大纲》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④。李春建认为只有从主体的角度,从劳动主体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非物质劳动的当代意义,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里,内格里超越了福柯,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

由于内格里的理论立场是生命政治权力,因而并没有真正达到历史唯物主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所思考的人,往往是一般的人,而不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因而过于思辨。另一方面,他虽然坚持劳动这一维度,但表现为对物质劳动的过于排斥,而没有真正弄清楚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间的关系。正如内格里所说:“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命政治的框架,这样一

①[美]哈特、[意]内格里著,王行坤译:《大同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②[意]内格里著,刘长缨译:《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前言》,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9期,第55—58页。

③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7.

④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Trans. Harry Cleaver et al. New York, London: Autonomedia & Pluto Press, 1991, p.8.

个框架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更有用。它提示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只是在生产剩余价值，或者是在生产劳动产品，它是在生产一种社会形式，在生产一种价值体系，在生产一种社会经验的结构。”^①内格里的视野是可取的，但一切非物质劳动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物质劳动为前提和基础。任何人不可能停止吃、穿、住、用，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停止物质生产，这是一切人生存的基础，也是一切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剥削阶级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产品为生的。整个上层建筑是以国家占有社会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产品为前提的。非物质劳动者，例如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活动家之所以能不劳动，也是以一定的方式，即非物质劳动方式占有社会的剩余劳动产品和时间为基本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②“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劳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本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③

颠倒了这个原理，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颠倒。从这点讲，内格里又是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如李春建对内格里所作的正确评价：“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劳动解放的传统，在劳动领域挖掘革命的潜能和建构政治的主体，揭示出非物质劳动已被

^①[美]哈特、[意]内格里：《帝国与大众——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与上海学者座谈会》，载于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资本所吸纳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但是,从彻底性上讲,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概念,作为其替换形式的生命政治劳动则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概念,两者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还无法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除了弄清非物质劳动并揭示它的当代意义,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学术性。为了弄清帝国的内涵和本质,李春建在序言里思考了二战前卢森堡、霍布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思考了二战后弗兰克、沃勒斯坦的依附理论、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与伍德的资本的帝国理论。为了弄清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李春建不仅细读内格里的《帝国》、《大众》、《大同世界》三部曲,作了深入的文本梳理,而且认真研读《资本论》,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资本论》立场后退并进入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第四章专门对非物质劳动概念作了历史性的学术考察。并用二章对内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作了探讨,尤其是学术价值的探讨,非常出色,正是在这里,作者把内格里思想与当代最有国际影响的著作作了比较,以揭示非物质劳动的当代意义。这些著作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杰里米·里夫金的《工作的终结》(1995)、《第三次工业革命》(2011)、阿尔文·托夫勒的《财富的革命》(2006)和安德烈·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1982)、《非物质:知识、价值和资本》(2010),充分显示了本著作的学术功底与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哲学是对时代思维的考察,要把握时代的本质是非常难的,文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难免的缺点和不足,但不失为青年学子对时代本质的一次认真思考,谨写此序,以引起学界的共鸣与思考。

孙承叔